

主编 褚钰泉 一本关于书的书 阅读趣味尽在其中

蒋介石的得失成败之间

史传是思想认识方式

《文汇报》美学讨论漫忆

王实味与鲁迅

傅鹰：「中右标兵」的悲情

曾被归入「敌档」的照片

胡耀邦和薄一波

有关林彪和「九一三」的疑团

末代皇帝身边的共产党「卧底」

从苏共精英到俄罗斯的新权贵

# M 悦 读 K

第二十八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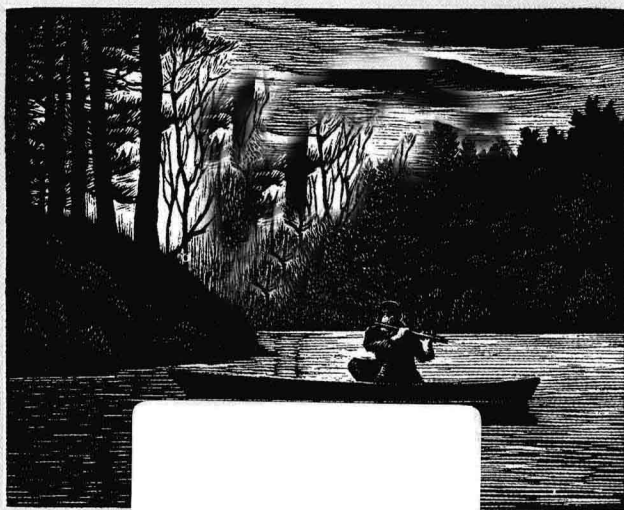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28

# M 悦 读 K

第二十八卷

主编 / 褚钰泉 一本关于书的书 阅读趣味尽在其中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28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悦读MOOK. 第二十八卷/褚钰泉主编.—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2.8

ISBN 978-7-5391-6919-4

I. ①悦… II. ①褚… III. ①书评-选集 IV. ①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46776号

## 悦 读MOOK (第二十八卷)

---

主 编 褚钰泉

责任编辑 熊 焱 张海虹

特约编辑 林 韵

美术编辑 徐 泓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25)

yuedumook@126.com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30mm×1092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9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91-6919-4

定 价 20.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 卷首语

二十年前,提起“蒋介石”这个名字,人们立即联想到“人民公敌”这四个字,把他看作怙恶不悛的“反动头目”。其实,不少人连他的照片都未见过。脑海中的印象多半来自某些教科书的描述,以及漫画中那个额头上贴着膏药手中握着匕首的形象。然而,时代在进步,改革开放打破了许多禁锢思想的固有框框。蒋介石日记、书信、档案等相继解密,研究人员得以从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中作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逐步还其以本来面目。本卷刊登的陈铁健先生的《得失成败之间》,就是一篇这样的文章,颇可一读。

由此得到一点启示:很长一段时期来,对待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我们总习惯于作简单的判断:非黑即白,非白即黑;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万事皆恶。推而广之形成这样一种思维逻辑:敌人反对的,我们必须支持;敌人支持的,我们都要反对,否则就有“立场”问题。历史现象及社会矛盾纷繁复杂,只有通过大量事实的综合分析,才有可能理出头绪,透过现象认识其本质。“爱而不知其恶,憎而遂忘其善”此类绝对化思维方式,是难以得出公正而符合历史真实的评价的,其后果贻害无穷。本卷介绍的傅鹰教授的遭遇,也说明这一点。这位怀着报国热情的海归科学家,因所在单位基层领导的绝对化思维方式,一直被视为“批判对象”,使之心力交瘁,痛苦不堪,许多精力被白白浪费。类此教训,令人痛心。

而今我们的经济要不断发展,政治体制的改革要进一步深入,人的思维如果不跳出旧的窠臼,是难以适应的。温家宝总理多次说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他一生崇尚的格言。他鼓励大家发扬崇尚理性,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对人对事如能做到这点,才有可能真正摒弃绝对化的思维方式,让思想赶上形势的发展。

## 目 录 Contents

特 稿	得失成败之间——写蒋介石人生的一本新书	陈铁健 / 005
	史传是思想认识方式	李洁非 / 016
	繁花, 总被风吹雨打去 ——《文汇报》美学讨论漫忆	林 韵 / 028
	“高、饶反党集团”的一点启示	徐庆全 / 038
文坛钩沉	王实味与鲁迅	李建军 / 046
	茅盾与张道藩的一段往事	钟桂松 / 056
	《马思聪蒙难记》重版记事	王培元 / 066
人 物	傅鹰: “中右标兵”的悲情	陈徒手 / 072
	我女儿的朋友都是我的儿女 ——访杨绛先生	章廷桦 / 081
闲话出版三十年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乎 ——德国法兰克福书展杂谈	陈万雄 / 085
书与插图	冰岛渔夫	汪家明 / 088
域 外 风	现代人的共同追求	萧文泉 / 096
	赫鲁晓夫的趣闻轶事	述 骏 / 101

悦读一得	辛亥革命的史料新编 记忆何以要捍卫 ——读《捍卫记忆——利季娅作品选》	张耀杰 / 109  吴俊忠 / 112
艺苑杂谈	《决不让步》在寻找什么	彭小莲 / 115
“老照片”札记	曾被归入“敌档”的照片	冯克力 / 119
海外书情	普京的真实面目——战时大酒店——现代战争和西方的兴起——罗马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列宾名画的历史背景——犹太教的百科全书——从啤酒消费看世界——托马斯·曼的美国之旅	/ 125
书海巡游	▶ 有此一说 ◀ 最近三十年中国取得的成就只是中等水平的历史地位的恢复——几百个文件管不住大吃大喝——中国富豪特别多——中科院报告称中国农业经济水平落后美国一百年——我国控烟形势并不乐观——我国宽带发展与世界的差距愈来愈大	/ 132
	▶ 历史往事 ◀	
	对胡耀邦的点滴回忆	胡德平 口述 周海滨 整理 / 135
	胡耀邦和薄一波	司马亮 / 139
	有关林彪和“九一三”的疑团	张聿温 / 142
	“毛泽东思想”是如何提出的	刘金田 吴晓梅 / 151

► 人物志 ◀

- 末代皇帝身边的共产党“卧底” 贾英华 / 153
- 梁漱溟如何走上北大讲坛 张建安 / 157
- 鲁迅与沈从文为何从不往来 王 凯 / 159
- 李济去台湾的前前后后  
——李济之子李祖谟口述 陈 远 / 161
- 高晓松看守所自述 高晓松 / 165

► 国情点滴 ◀

- 南海之争 姚冬琴 / 168
- “八〇后”是怎样一个群体 李春玲 朱 迪 / 170
- 国企高薪的迷雾 郎咸平 孙 晋 / 173
- 谨防“民意”成“名义” 严行方 / 175
- 贪官外逃知多少 冬 琴 / 178

► 图与文 ◀

- 百年前的云冈石窟 [日]山本赞七郎 摄影 / 180

► 信息荟萃 ◀

- 毛泽东未去南湖继续参加一大会议——  
高官落马后的非常生活——美国驻华使  
馆揭秘——三百位外国政要开通中国微  
博——从“白卷英雄”到亿万富翁——蒋经  
国治赣南 / 183

► 四面八方 ◀

- 从苏共精英到俄罗斯的新权贵 周 宇 / 193
- 俄罗斯内阁的“八〇后”和“七〇后” 张晓东 刘 畅 / 198
- 国宝贩卖侦破记 王俊秀 / 201

# 得失成败之间

——写蒋介石人生的一本新书

◎陈铁健

中国自一九一一年清皇朝覆灭以后，皇权专制以其根基深厚，名亡而实存。在各色包装下专制丑剧重演不歇。继袁世凯之后，蒋介石算是后皇权时代第二人。蒋氏皇朝，存大陆二十二年。退居台岛，蒋介石主政二十六年，蒋经国执政十二年，至一九八七年蒋经国实行政治体制改革：“还政于民”，“党主”变“民主”，前后整合一个甲子。

蒋介石在大陆二十二年的短命政权，既得之于马上，又失之于马上；既成之于顺应民意，又败之于失掉民心。在民国历史的动乱杀伐争斗中，蒋介石铮然佇立，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寿终正寝，虽不伟大，却属“非凡”。写他不易，评他也难。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一书，由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三位胆识兼备年富力强的民国史优秀学者联袂撰写，虽观点有异却相得益彰。

作者充分利用《蒋介石日记》，探寻曲藤蔓草掩荫的历史荒径，勾勒由盛至衰的沧桑剧变。斯世霸业更替、江山易手的风云往事，斯人权谋纵横、复杂多变的性格心理，尽呈笔下。几近于句句写实，字字求真，可以说代表了近代史学界众多学者承续的朴茂稳实不蹈空虚的学风。

## 孤家寡人的性格

作者说，性格决定命运。蒋介石九岁丧父，记忆中几乎不涉及其父。少儿时代寡母孤儿，母织儿读，共居处，同休戚。恋母情结，使其性格带有某些女性型：阴柔，敏感，细致，多愁，多疑，整洁，操劳细事，等等。无严父管教，养成顽劣张狂天性，铸就不屈不挠意志。孤儿寡母受人欺凌，使其深感社会不公，世态炎凉，人情淡薄，起而奋斗、雪耻、革命。自幼缺乏对人的“基本信赖”，幽暗疑惧，常叹“国中多荆棘，世



上无知音”(日记,1923年8月10日)。“人心险诈恶劣,畏我者固为我敌,爱我者亦为我敌,必欲我皆为其利用而后快心”(1930年12月9日)。“父母妻子之外,皆无诚意已待之人,此为人情之常”(1943年12月6日)。蒋一生对上对下对同事常怀猜忌。除终生服膺陈其美一人,对孙中山亦若即若离,动辄拂袖,不告而辞。强烈自恋,藐视一切,求人不如求己,视部属为“无能”、“无用”、“愚蠢”、“幼稚”。军事将领“无能”,只好由他自己越级指挥;行政干部“无用”,只好兼职数十。“对内对外,对老对少,对文对武,皆须一人亲当”(1939年9月23日)。既然天下无才,党国无人,任何人都不可信赖,也就只能由他孤家寡人来专断独裁了。

### 圣贤、豪杰、领袖的读书取向

蒋介石一生以圣贤、豪杰、革命领袖自诩。读书成嗜,对儒学经典推崇备至,反复精读,边读边反省自赎自勉。崇拜曾国藩,其着眼处在立志养气,立品修身,以致圣成贤为目标,日记中所写此类读书心得

俯拾即是。圣贤乃其精神追求,实用目的则是从读书中吸取军事谋略和政治权术。《孙子》《管子》《韩非子》《墨子》《礼记》《圣武记》,都是常读之书。他对政治家宋代王安石、明代张居正两人情有独钟,敬佩王安石变法推新之举,张居正治术、气节、才情和机遇。指定各部部长必读《张居正评传》,随后定为全党干部“应读书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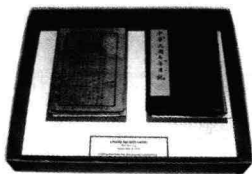
“五四”时期,中国步入“革命时代”。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弄到“革命”高于一切。人以革命与否定新旧,事由革命与否判正反。蒋介石从一九二〇年代起阅读《新青年》《新潮》《新村记》《易卜生》《俄国革命记》等书刊,追踪新思潮,揣摩新风气。杜威、马克思、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皆在涉读范围。一九二三年赴苏俄考察前,与共产党人瞿秋白、张太雷两度晤谈,了解苏俄情状。赴俄途中、抵苏之后,饱读马克思学说著作,兴味浓厚,“乐不掩卷”。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五年间,先后阅读俄、法、土耳其革命史,俄国共产党史,列宁丛书等。其中,俄、法革命史两书,一九二六、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年多次阅读。一九二七年国共分家后,已往研究者多认为蒋介石“叛变”了革命,而国民党仍自视为革命党,蒋介石亦自视为革命领袖。国民革命军挥师进行二次北伐,横扫华北,直捣平津。越年,东三省易帜,国民革命大功告成。失败的是莫斯科设计的“革命”幻想,诸如:变国民党为工



1949年春,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在浙江老家最后一次祭拜先祖汉亭侯蒋澄。

农党；变国民革命为工农革命；变蒋介石为“雅各宾”党人，汪精卫为“左派领袖”；变国民政府为亲苏政权；变减租减息为暴力夺取土地，等等。蒋介石将其统一国家，稳固政权的一切措施。都视为是国民革命的继续。此时，他反复阅读各国革命史，并非认同各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而是力图汲取各国革命成败的经验教训，借鉴治国方略。

蒋介石主政时期，内忧外患交迫。其读书也会有某一具体目标。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蒋阅读《日本侵略中国计划》后写道：“开卷有益，乃知吾人前日对外交之忽略而致有今日之失败，悔无及矣，以后应每日抽暇看书一小时，而且对外交尤应注意也”（1932年2月19日）。两天后又看到《日本侵略满蒙计划》，“益觉本身知识之浅，误国自误之罪也”（1932年2月21日）。为建立特务组织，蒋介石读《俾斯麦传》，叹服俾斯麦的铁血主义：“病弱之国，惟‘铁与血，危与死’四字，乃能解决一切也，尤以利用危机以求成功为政治家惟一特能也”（1932年4月20日）。又读《各国情报之内幕》，谓为“近今最爱最要之书……从政者非知此不可也，得益非浅”（1932年4月22日）。此际，正是他筹建军统特工机构之时。



2009年，最后一部分《蒋介石日记》也在美国胡佛解密。



《蒋介石日记》手稿

蒋介石不能直接阅读外文原著，除“五四”时期接触马克思，杜威学说外，抗战时期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持续阅读《黑格尔辩证法》，并指定为“干部应读书籍”之一。说是“革命斗争而不知辩证方法论，如何能不失败呢？”（1938年12月7日）“昨夜因晚餐后研究黑格尔哲学太迟，故又失眠不宁，今晨八时后方起床”（1940年12月18日）《蒋介石日记》中不止一次地写着“研究”黑格尔，足见其兴趣浓厚，颇为认同，而非普通的阅读。不过一九四一年后又说：“黑格尔矛盾学说，与中国阴阳消长学说对比，乃知中国哲学为可贵也”（1941年7月3日）。作为中国传统读书人，蒋介石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志趣爱好、行为规范，终究是保守的、封闭的、偏狭的。

## 博弈于“党国元老”间

孙中山一九二五年逝世后，国民党党魁继承人之争最初主要在胡汉民与汪精卫之间展开。蒋介石虽资历地位低浅，却异军突起。本书指出，过去学界多将焦点集中于蒋、胡、汪三巨头的权力争斗与消长，而对其外的“党国元老”的政治背向和影响关注不足。

国民党素宗“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法则，党内不同派系为了合法存在，须先在党内制胜对手，夺得“正统”，以“中央”名义号令全党，宣布对手为“伪”组织，或开除其党籍。“党统”如

此重要,争夺“党统”也就成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内各次文争武战的核心问题。胡汉民、汪精卫,被视为“党统”的象征性人物。前两届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多是党内文人精英,被视为“党国元老”,也具某种号召力。蒋介石既要与胡、汪争高下,又需处理与其他“元老”的关系。一九二五年八月,廖仲恺被刺杀,胡汉民涉嫌被流放,许崇智被逼走。一九二六年三月,“中山舰事件”发生,汪精卫负气出洋,蒋介石得以掌控广州大局。为维持其在广州中央的权位,希望继续得到苏联、中共的支持,蒋介石竟与被中共定义为“右派”的西山会议派元老们划清界限,双方关系趋于恶化。武汉攻克后,国民党左派和中共怀疑蒋介石日趋右倾。武汉方面通过迁都之争、党权运动、迎汪倒蒋运动,企图剥夺蒋介石日益膨胀的军权,固然近于天真,胜负可知。不过,蒋介石若要另立中央,仍须取得“党统”的合法性。此



1927年,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

时,左派大多留在武汉辅佐回国的汪精卫,右倾的大多加入西山会议派,蒋介石必须另谋出路。

本书引述陈果夫回忆,是他建议蒋介石借重中央监察委员会中的“老同志”,取得他们对“清党”反共与另立中央的支持。于是,出现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等“四老”联手辅蒋的局面。四人中,蒋与张静江交往早,交谊深,是结盟兄弟。“中山舰事件”后,蒋安排张任中常会主席,与武汉左派和中共对峙。吴、蔡、李三人是党国元老兼名流学者,具有特殊社会地位,仿佛代表一种道德力量。正是由四老领衔,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提出弹劾中共案,使蒋介石的“清党”反共赢得社会道义基础。当然,其真实作用,不过是在蒋介石军权之上增添一些“合法性”而已。“四一二”事件发生后,尚站在武汉一边的宋子文说,“国民革命的主旨是以党治军,就是以文人制约武人。现在都完了。”西山会议派表示愿与蒋合作“清党”,为蒋所拒,并查封西山派上海“中央党部”,直到六月七日才恢复西山派诸人党籍。

随后,在蒋介石、汪精卫、西山派所代表的宁、汉、沪三方角逐中,蒋左右逢源,先与胡汉民合作,击败左翼改组派和右翼西山派。继而经中原大战,击败地方实力派与改组派、西山派的大联合反蒋势力。蒋、胡合作的三四年间,党内元老相对保守的政策主张,多被采纳。蒋对“四老”尤为倚重,而胡汉民的右倾立场与元老们的保守趋向更相一致。在蒋介石看来,保守

现状是维持政治稳定的第一要素，援用老成持重者参政尤为重要。查阅《蒋介石日记》，此期参与时政大计者，除“四老”外，还有谭延闿、戴季陶、朱培德、张群、黄郛等元老人物。

蒋介石与元老之间，也有难解的分歧。本书认为“老先生”固执于反共反俄，甚至恐共惧俄，而蒋更多着眼于现实政治的考虑，认为对俄外交应加“研究”，对党内左派不应视为共党，不可一网打尽。蒋对“老先生”们的保守，时怀不满，认为张静江、李石曾“不通现代政治”（1928年1月21日），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戴季陶等“对俄不准研究，是何心耶”（1928年8月1日）。而对与蒋本无渊源的蔡元培所主张的教育、文化、人权理念，蒋更忌恨不已。

胡汉民的保守与固执，远远超过“四老”，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尖锐。胡号称坚守孙中山遗教，坚持“党权高于一切”，并以“党权”化身自居，视蒋为“不知政治”的军人。常以立法院长身份牵制蒋介石，遇事专擅，使蒋觉得“一切政治皆东牵西扯，不能运用自如”，无法再容忍下去。一九三一年二月，胡汉民以孙中山遗教为“大法”，遗教中无“国民会议定约法”内容，反对蒋介石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和颁布约法。蒋遂拘胡于南京汤山。“汤山事件”固为权力之争，也有“路线”之争的成分。王子壮日记云：“蒋先生因欲一新耳目，坚持需此训政约法……欲各方兼容并包。”所谓兼容并包的实质，在于加固专制基础，表现较为灵活的实用手段，而胡汉民则坚守教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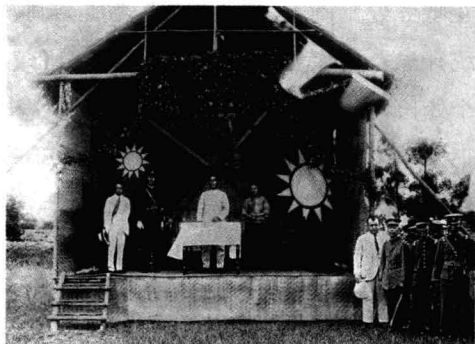
僵化不进。迷恋武力愈加自信的蒋介石说，“开国端在武功，有武功不患文治。书生如本党之老学究，诚不足言文治也”。（1931年5月21日）“一任所谓元老先进之摆布，对于外交财政皆不能坚持主张，又不培养人才，而一意迁就昔日之朽污”，“深以为悔”（1933年9月26日）。

一九三一年后，蒋介石主动征询元老们意见愈来愈少，关系日益疏离。元老们更趋于韬晦无为，而集结元老们的国民党中央常会、中政会、中监会，均每况愈下，一度有名无实了。

### 改善与“智识阶级”关系

蒋介石在统治大陆期间，先后经历三次下野，分别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和一九四九年一月。前两次缘于党内分裂，第三次则因中共军事打击和美国的抛弃。本书援引《蒋介石日记》，证明蒋每次下野后都会深刻反思，重建信心，东山再起。

第一次下野返奉化家乡，连续十天记下反思所得，归结为“组织不完，统系不



1924年6月，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主席台上自左至右分别为：廖仲恺、蒋介石、孙中山、宋庆龄。

明,用人不慎,为失败之原因”(1928年8月19日)。应加强黄埔势力,训练学生,培养优秀干部,并拟以一年为期赴日、德、法、英、美、土、意诸国考察外交,学习经济、政治、社会、哲学、军事。后因国内局势发展超出预期,遂决定联合旧日反对派,与粤系李济深、桂系李宗仁适度妥协、放权,以保证二次北伐作战。北伐胜利后,仍在中央政府外分设四个政治分会,求得党内的暂时平衡,最终实现集权。

第二次下野后,仍返奉化进行反思,认为最大问题是“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以致酿成“今次革命失败”,“此后如欲成功,非重起炉灶,根本解决”(1932年1月8日)。

蒋介石再次复出后,用一年时间进行调整。他说“求人不得,只有另建团体,集贤聚才以代之。”(1932年4月8日)决定另建一个以黄埔毕业生为中心,绝对忠于他个人的秘密核心组织。最初设想称“少年党”,后命名为“三民主义力行社”(1932年2月29日)成员大多为三十岁上下的青年。力行社下设特务处,以戴笠主其事。在特务处基础上,建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徐恩曾、戴笠、丁默村分任三个处长。正是这三人在以后的民国特工史上分掌中统、军统和汪伪特工总部。第二处为力行社特务处之原班人马,处长戴笠可直接面蒋报告工作,更受蒋的倚重。

为了扩大政权的统治基础,加强他在国民党内的领袖地位,蒋介石一九三二年复出后,注重改善与“智识阶级”的关系,

广泛吸收知识界精英参加政府。面临政权建设的新课题,延揽外交、教育、财政、经济和政治建设的人才,成为当务之急。“以后当于每星期研究一次或两次,一面可以交换知识,一面可以选拔人才,而且得以联络感情也”(1932年3月20日)。替蒋延揽许多党外大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人物是钱昌照。他是蒋介石盟兄黄郛的连襟,深得蒋的信任,又同教育界有广泛人脉关系。钱回忆说,蒋介石“是军人,惯于纵横捭阖,拉拢吞并各方军阀,有时甚至用大笔金钱收买,但知识分子不容易用金钱收买,而且他与知识界也少有渊源,所以他乐于我为他撮合。”(《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在钱昌照安排下,蒋介石自一九三二年四月至十二月,有计划地召见大批学界精英,虚心请教。

在经济建设方面,有以下系列讲座或谈话:中外人士讲土地制度(5月13日);统计学与土地学及规划(5月14日);国际经济之趋势(5月19日);国际经济与中国之关系(5月24日);马寅初讲国际经济(5月27日);钱昌照谈俄国五年计划(6月2日);翁文灏讲中国煤铁矿业之质量(6月17日);翁文灏讲中国各省矿质之分量(6月18日);翁文灏讲东北与西北农产地之分量(6月19日);徐鼎谈经济问题(7月20日);胡汝麟谈大国财政制度(7月21日);研究共党土地制(7月31日);杨端六讲币制(8月9日);吴达铨谈经济、商业、贸易、交通、农业等(9月30日);刘秉麟讲经济学(10月10日);刘秉麟谈苏联设计

经济计划(10月11日)

在政治建设方面:罗贡华谈政治自治方法(5月10日);俞大维谈政治人事(6月20日);萧一山谈中国治道(7月19日);周鲠生谈东省法律问题(7月21日);王世杰谈英国政治制度(7月27日);听讲美国政治制度(7月28日);听讲法国政治制度(7月29日);听讲俄、意政治制度(8月5日);与程天放谈民族主义为三民主义之基本,与梁千乔谈组织(8月26日);胡适之谈教育方针与制度(12月2日);李维果讲德国复兴史(同日);李维果讲土耳其史(12月8日)。

在外交和国际关系方面:周鲠生谈国际形势(7月20日);周鲠生谈领事裁判权(7月22日);周鲠生讲国际联盟会情况,与周炳琳等谈话(7月26日);徐淑希、翁咏霓谈外交(7月28日)。

在与知识精英交往中,蒋介石受益良多。聆听地质学家翁文灏讲授中国煤铁矿产分布,知东北三省占全国总量百分之六十以上,尤其铁矿百分之八十以上为日本占有,蒋“惊骇莫名”,“中正梦之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6月17日)。听完西方各国政治制度,蒋说“余于政府则仿美国总统制,立法则仿德国之三院制,于选举则地区与职业并重,于中央与地方权限关系则仿法国制”(8月4日)。又说“以职业团体为经济议院,以代众议院职权,以国民党中央会议为参议院,以各省区与各民族选举当中议院,此近日对于政制之研究也”。“无论对外之不平等条约,与对内之



抗战爆发,蒋介石通过中广发表抗战声明。

各反动派,此时惟一要件乃为速平内乱。此后对于发展经济与教育,此二项组织与方针,必以民族为基础,而以不平等条约为对象也”(8月5日)。从中可见蒋介石的民族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政治取向。

蒋介石改善了他与知识界的关系,吸引了一批党外知名学者进入国民政府,如清华大学代校长翁文灏,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南开大学教授何廉,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等。蒋介石一时得到不少原本反对他的知识界学人的青睐,声誉渐佳。从一九三二年起,国民政府对教育经费的投入大增,一九三六年担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称:“四年以来,中央直辖各校之经费从未短欠,此实为民国以来空前之纪录。”(王世杰《训政时期约法与最近教育工作》)执教中央大学的郭廷以教授说:“一九三七年前五年,可以说是民国以来教育学术的黄金时代。”(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蒋介石此举,改变了此前被党内外视为军事而非政治领袖的形象,胡适在国民党五全大会召开前公开表示:“蒋先生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是一个事实,因为更没有人能和他竞争这领袖的位

置。”(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谈蒋介石日记》)

## 政府改组与币制改革

国民党自一九二七年当政后,一直实行以党治国的“训政”体制,由国民党垄断政权。抗战时期,成立国民参政会,作为国民党与其他政党、派别的议政机关。及至抗战胜利,在与中共文谈武斗之间,蒋介石为争取美援,拉拢民众,需要摆出民主宪政姿态。从一九四六年一月包含政府改组内容的政协决议,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由国民党主导的“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到一九四七年四月国民政府改组完成,经过一年多曲折反复过程。除中共和民盟拒绝参加“国民大会”和政府外,青年党、民社党和无党派人士鲁琦、李璜、陈启天、左舜生、李大明、蒋匀田、伍宪之、莫德惠、陈光甫、王云五、常乃惠、鲍尔汉等分别进入国民政府委员会和行政院。

本书指出,蒋介石起初颇为乐观,拟增设行政院的部会,安插更多党外人士,尽快实现政府改组,而青年党自视历史

久、党员多、分布广,希望分得几个部做官。民社党更强调民主宪政和小党独立。两党虽然附国反共,但亦知内战不得人心,名义上仍主以和平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在具体问题上,蒋介石小有让步。如青、民两党提出,政府改组后,不再是国民党一党专政,不能再举行总理纪念周,诵读总理遗嘱,等等。蒋即决定,各级政府不再举行总理纪念周,不再逢会必诵总理遗嘱,但各级党部不变。谈判中反复博弈,进展缓慢。蒋介石怒斥“青、民两党刁难索诈,不一而足,甚至层出不穷,无耻之至”(1947年3月29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为政府改组寻求党的授权。尽管蒋介石交底说:“无论如何,至少今后二十年内,建国的责任仍然要由本党来担负”,政府改组问题仍然引起党内强烈反弹。中执委、中组部副部长谷正鼎质问:是否有人当吴三桂?党不能由几个政治掮客出卖。候补中监委钟天心公然说,本党有五十年的革命历史,我们的党员也不能都有官做,如果青年党全部党员都要做官,这是不合理的,不能答应,否则得不到全党拥护。全会经过讨论,改组政府成议总算未被推翻,但异议并未完全消失。

本书认为,此次政府改组,因其引起党外人士全面参加政府,至少在形式上使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训政”体制开始变容。而其实际并未改变国民党一党独大、主导并控制国家政务的局面。蒋介石只留出几个非关键部门(经济、农林、卫生、交通等)



1937年在革命元老朱培德上将的葬礼上,蒋介石面容哀恸,感伤不已。

作为多党合作执政的“民主”点缀,主要是做给美国人看的。青、民两党,不过是扮演政治花瓶而已。蒋介石指示,国民党对政府的领导方式应由明到暗,“至少应在表面上不露痕迹”。凡有关党对政府之决策及人事决定,均须通过行政院会议或国务会议,事先不宜公布,且应保守秘密,以免招致国内外批评本党一党专政,刺激少数党。本书进一步指出,蒋介石多半依赖于武装和暴力起家,信奉武力,依恃军队。他的思维方式,自然以“革命”为先,“民主”为后,甚而是有“革命”而无“民主”,对可能危及国民党一党专制地位的“民主”(经由选举和实现政府组成及更替的制度性安排)有着本能的反感与警惕。至于民、青两党中有识之士的主张(军队国家化,各党平等参加军事机构;防止官僚资本之发展,监督国营产业;平等参予宣传机构;保障人权,实行宪政,公平竞争),虽然不无意义,却生不逢时,无法兑现。

进入一九四七年夏,国共内战爆发不到一年,随着国民党军在军事上的惨败,以首都南京为中心发生大规模反内战反政府的学潮。蒋介石自云:“军事、经济、学潮均在激荡险恶中剧变,稍一不慎即可崩溃”,“本党党员大部亦意志动摇,信心全失,不知其责任何在也”(1947年5月22,24日)。五月二十九日,蒋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吴贻芳午餐,“吴述特警凶暴殴学生状”,蒋忿然说:“是我叫他们打的,他们奉我命令打的,他们是自卫,否则学生打他们了。”(《黄炎培日记》第九卷)



1949年,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及其将领步下台阶,蒋介石时年62岁。

此时,蒋介石连日召集干部,“研讨各大学清共时机与方法”(1947年5月24、25、27日),党内高层对此意见不一,难以决断。直至七月初,蒋实行全国总动员、集中全力反共之议,始获通过。七月四日,国民政府通过“全国总动员案”;18日,公布《动员勘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随后,行政院、国防部、教育部公布一系列法令:动员兵役、工役和资财;惩处停业、关厂、怠工;管制言论(文字、图画、演说);动用警察、宪兵、警备部队镇压游行、请愿、罢工、罢课等等。在首都设立中央特种刑事法庭,若干地区设立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实行严刑峻法。蒋介石“勘乱动员”之举,表明其统治正在急速走向衰颓,非但不能维持社会稳定,反而凝聚社会各阶层的不满,更加离心离德。

进入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军事形势恶化之外,财政金融经济濒临崩溃。政府开





蒋介石在台湾办公

支几乎全靠印钞票，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八月，上海米价由一月的每石一百五十万元升至五千八百三十三万元，金价每两超过五亿元，法币与美元兑换价超过一千万比一。蒋介石决策实行币制改革，以金圆券替换已使用十三年的法币。币改主要内容：一是发行金圆券并强制回收个人和法人所拥有的金、银和外币，违者没收并予惩处；二是严格管制物价，不得议价，严惩囤积居奇者，废止按生活指数发放薪金办法。上海是币改重心，蒋经国坐镇主持其事，初时大刀阔斧，重拳出击，颇见成效。及至“打虎”打到孔祥熙公子孔令侃所办扬子公司囤积居奇、营私舞弊案，宋美龄搬出蒋介石以徇私情。蒋在东北会战军务倥偬中，由北平直飞上海，训示蒋经国放过孔令侃。此案受挫，令民心大失所望。蒋经国既无力，也无颜再推动“打虎”。随后，限价政策也难以继，只好取消。十一月，蒋经国在无可奈何中黯然离开上海。

币改放出的金圆券急计八十二亿元，为最初发行限额的四万多倍；物价狂涨，为币改之初的五百多万倍，金圆券已成废纸，币改仅由蒋介石等少数人仓促决策，

强力推行。然而，用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最终无法避免经济规律的惩罚。短短七八十天，从升斗小民到资本大户以其辛苦和血汗积攒的金银外汇甚至全部家当，顷刻化为乌有。至十月底黄金一百六十五万两，白银九百零四万两，银元二千三百五十五万元，银角、美元、港币，折合美金共计一亿四千二百十四万元，全部落到政府金库。民众的愤怒达于顶点，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日记：“无人敢信任政府矣。”自由派人士储安平怒斥道：“多少老百姓的血汗积蓄，就滚进了政府的腰包。”“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污烂，污烂，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一场烂污》）在上自大学教授下至平民百姓的眼中，无论谁当政也比国民党为好，似乎成了定论。

蒋介石对币制改革失败，似乎并不太在意。此时，除军事危局占据其考量中心外，他对“老旧”的国民党已近于绝望，而有意另起炉灶，改造旧党使之“新生”。蒋介石与蒋经国谈论时局：“甚叹党政军干部之自私无能、散漫腐败，不可救药。若欲复兴民族，重振革命旗鼓，非舍弃现有基业，另选单纯环境，根本改造，另起炉灶不为功。故现局之成败不以为意矣。”“深信有我在世，必能使我国家民族转危为安”（1948年11月23、24日）。蒋介石的自恋、固执、自信、坚定心理，于此尽显。

蒋介石此时在意于退守台湾的先手准备，安排撤退的种种措置：抢运黄金